

LUSEFAZHANYU

SHENGTAIWENMINGJIANSHE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如果能够率先实现一种生态化超越现代化的绿色复兴，
将从根本上克服当今世界诸多难题，
其示范与启示价值将不言而喻。

郇庆治 高兴武 仲亚东◎著



LISEFAZHANYU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LUSEFAZHA

SHENGTAIWENMINGJIANSHE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如果能够率先实现一种生态化超越现代化的绿色复兴，
将从根本上克服当今世界诸多难题，
其示范与启示价值将不言而喻。

郇庆治 高兴武 仲亚东◎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 郇庆治，高兴武，仲亚东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561-0023-1

I. ①绿… II. ①郇… ②高… ③仲… III. ①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IV. ①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460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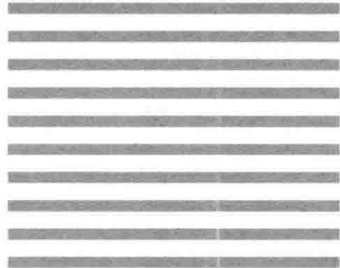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编 著 者 郇庆治 高兴武 仲亚东
责任编辑 杨 纯
装帧设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023-1
定 价 3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一体两翼”

一、从科学发展到“三个发展” 005

二、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 014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背景与中国语境 022

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043

第二章

绿色发展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量化评估

一、绿色发展的三重向度 062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 074

三、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 087

第三章

生态文明建设实例分析：福建

- 一、从“生态省”到“生态文明示范区” 098
-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评估 104
-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三明 114
-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挑战和对策 119

第四章

生态文明建设实例分析：浙江

- 一、从“生态浙江”到“美丽浙江” 129
-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评估 140
-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临安和安吉 149
-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挑战和对策 156

第五章

生态文明建设实例分析：江苏

- 一、从“绿色江苏”到“生态江苏” 166
-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评估 172
-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南通 181
-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趋势、挑战和对策 185

第六章

生态文明建设实例分析：山东

- 一、从“生态省”到“生态山东” 204
-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评估 211
-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聊城 220
-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趋势、挑战和对策 223

第七章

比较与理论分析

- 一、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量化评估及其比较 234
- 二、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与多样性 249
- 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机遇与挑战 261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81

导 言

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环境难题的理论阐释和环境难题的应对思路。当然，一种理论阐释本身往往就蕴含着某种特定的应对思路或路径。但总的来说，一种完整的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必须包含上述两个方面。

比如，2013年夏公布的、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完成的联合国研究报告（《参考消息》2013年8月5日）提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源消耗国。该报告认为，中国从死气沉沉的农业国家向欣欣向荣的工业国家的转变，也让它以世人未曾见过的速度和规模消耗着资源。30多年来，中国已经从对矿物、化石燃料和其他原材料消耗不多的国家，演进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2008年，中国上述材料的消耗量高达226亿吨，已远远高于1970年时的17亿吨，是世界第二大资源消耗国美国的4倍。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均物质消费量也在大幅度上升，从1970年相当于全球平均消耗量的约三成增加到全球平均消耗量的1.5倍。

这一报告的结论，其实蕴含着或构成一种特定的环境政治话语。因为，它既包括对当代中国面临着的环境难题的理论阐释，也包括对我国应对环境挑战的思路对策。就前者而言，我国目前遭遇到的诸多环境难题，

尤其是资源枯竭和环境的大范围退化，正是过去数十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副效果或巨大代价；就后者而言，现行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的扩张难以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很可能将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国际制约。

再比如，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彭马田发表在《南华早报》2013年8月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与宗教的儒学，也许会在“拯救”中国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首先引用了孟子的论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并认为，面对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地之“性”都难得一见的严峻现实，我们需要回到和挖掘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生态资源，使儒学与道教等一起在环境保护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彭马田先生的上述评论，其主要背景是，近年来国内儒学学者（比如北京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和南开大学的乔清举教授），正在试图对儒家思想和经典做一种“儒学生态学”意义上的阐释。他们认为，在环境危机应对上，当代世界需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持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新人文主义。早在2500年前，孟子就已明确指出，这个世界是我们从祖先手中传承的宝贵遗产。尽管我们很难指望这种理论重释会直接带来“立竿见影”式的节能减排功效，但是，它不仅会催生大众看待自然界的方法论，因而有可能对雾霾、受污染的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创造欲和自身状态产生长期积极影响，还可能会对中国领导人今后所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道德依据上提供灵感。作为侧证，2013年9月初在河南登封市举行的第二届“嵩山论坛”的主题，就是儒学的“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并正式成立了“国际儒学生态联盟”（ICEA）。正因为如此，可以认为，明确致力于生态化的儒学或“儒学生态学”，已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尽管显然并不是“深生态学”或激进生态学的意义。

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都只是对客观存在的环境难题或危机的某一个侧面的解读与回应，同时又都是人们基于特定价值观念、认知水平和经济社会文化处境的主动建构。如果说前者所决定

的是，并不存在一种针对所有环境难题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环境政治话语，那么，后者则意味着，其实也很难真正形成一种全球性或国际性的绿色政治共识。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是全球气候变化（暖）及其应对。无疑，由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异常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首次明确形成的一个全球环境政治话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其最简练的表达。因为，它不仅明确包含了一种对气候异常这一当代世界生态环境挑战的理论阐释（高碳经济是罪魁祸首），而且包含着国际社会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的全球性应对（节能减排或走向“低碳经济”）。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变化节奏和应对举措的理解选择上都存在着重大偏差，结果是，以《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贯彻落实步履维艰。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2013年夏出现的全球性酷热天气，在欧洲很容易被解释为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异常的证据。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等机构报告的结论是（《参考消息》2013年8月16日），尽管人们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未来30年间更猛烈更频繁的热浪将不可避免。据预测，类似2003年袭击欧洲和2012年袭击美国那样的酷热天气，到2020年会影响到目前面积的两倍，相当于10%的地球陆地面积，而这一数字很可能在2040年实现翻番，程度也会加强。但在中国，尽管1/3国土成为“大火炉”，高温天气覆盖19个省份、面积达317.7万平方公里（《参考消息》2013年8月2日），使国家首次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II级应急响应，却很少有人愿意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来加以思考与反思，认为副热带高压和缺乏降雨是主要原因。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大量出自民间智慧的高温酷热验证“实验”：有人把煎锅放在地面或阳台上利用阳光直接烤肉，有人用阳台的栏杆烤虾，有人传屋里的鸡蛋自然孵化了，有人传车祸导致散落在高速路上的鱼不久就成为“烤鱼”，如此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所讨论的绿色发展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种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这意味着，它既包含对我国所面临的

生态环境挑战的成因和解决思路的系统性阐释，也是我们基于自身的特定价值立场与经济社会文化现实理解的一种愿景想象与期盼。

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一种传统模式主宰的现代化进程的历时性积聚或必然性结果。而要实质性解决环境问题或挑战，一种较为理想且现实的中长期愿景，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三个发展”）的内在性融合。说它是理想的，是因为，我们依此可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的切实提高和经济社会组织及其运行的生态化——这二者互为因果和相互促动，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绿色发展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量化评估，还仍然是在“发展”或“现代化”的话语与语境下展开的。无论是“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依然具有一种明显的发展取向或意蕴。

也就是说，尤其是从笔者的主观愿望和未来选择而言，我们真诚希望，一个经历了近百年现代化历史锤炼并取得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的当代中国，能够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为契机，勇敢开启从一个“世界工厂”转向一个“绿色中国”、“美丽中国”的历史性飞跃。而笔者同样清楚的是，借助“绿色发展”来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或绿色未来，并不是一种十分激进的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而它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这种相对温和的绿色话语，最终迎合或屈从于那些经过绿色装饰或包装的“发展欲求”，而不是成为绿化或重组现实中从经济社会制度到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绿色驱动”。

笔者从不拒绝、更不会贬斥激进大胆的“绿色乌托邦”话语的价值，但同样也坚信，一个民族国家或我们这个世界的绿色未来（就其现实可能性而言），只能寄希望于正确的认知、有远见的筹谋与果敢的行动。可以说，本书看起来似乎有些碎片化和细节化的陈述，其实就是想阐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而且能够实现一种绿色转型的环境政治或政治生态学话语。至于这种话语最终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打动人们的内心，就只有读者和时间来判断了。

第 1 章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一体两翼”

总体而言，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解，既取决于我们对二者各自本身的认识，也有赖于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本质的认识。以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正在发生一个实质性飞跃，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文明历史性复兴，进一步推进伟大实践的重要知识与方法论支撑。

一、从科学发展到“三个发展”

广义上的科学发展的理论认知及其现实实践，当然是一项离不开、而且最终要由千百万人民群众来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但它作为一种更为明智的现代化发展思路与战略，却首先是由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不断理论思考、概括和提升而得以系统阐述的过程。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并首次提到了科学发展的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党和政府不仅要考虑当下如何通过抓好非典防治工作，来尽快恢复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要着眼于长远，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也就是实现一种更加全面、平衡和协调意义上的发展。

在同年10月中旬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部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第三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强调指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标志着随后称之为“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正式提出与确认。

在2004年2月16日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温家宝总理做了“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讲话，而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同志在开班式上特别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关键，因为他们可以对全党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随后，《人民日报》3月下旬连续发表社论，分别阐述了“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努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领导水平”。

在此基础上，2004年4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这篇8000多字的讲话分三部分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过程、具体内容和贯彻落实要求。文章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讲话明确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总结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

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而获得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更具体地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至少包含了党和政府以下四个层面上的认识提高或新认识：

1. 我们需要从发展的角度系统总结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的成功做法与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比如，建国后很长时间内致力于创建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和强化农村义务教育的好做法在后来的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再比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分偏重，显然与如今的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持续恶化境况密切相关。很难说上述这些失误可以完全避免，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短板”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这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发展观出现了问题。

2. 我们需要从发展的视野来谋划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突出问题和矛盾。尽管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还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但至少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面对着的已是十分不同的矛盾和难题。比如，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分化、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明显、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等等。这其中的有些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产生的，但也的确有些问题恰恰是现行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所造成的，因而恐怕很难通过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得到有效解决。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探索一种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一方面重点和难点在于广大的中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以及城市中高达两三千万的生活困难弱势群体，如何使其真正享受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物质福利成果，另一方面必须使目前更多体现为经济增长、甚至是 GDP 增长的发展扩展为社会进步、环境改善、文化生活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同发展。因而，一种更加科

学的发展是我们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

4. 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使我们有条件追求与实现一种更高层次或质量的发展。无论是社会公正、科技教育发展还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都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保障,如今已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我国在这方面显然具备了更充分的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在从质上改变着社会各阶层公众的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质量需求、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与个性发展需求、更加开放的社会参与政治民主化需求,等等。所有这一切,将构成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追求与实现一种更有质量发展的强大压力或动力。而科学发展观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党和政府对变化着的人民群众发展需求的主动回应。

此后,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旗帜鲜明地强调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至此,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已基本成型,论述体系也较以前更加完整。相比之下,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只是更多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完整意涵: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二) 科学发展观的绿色意蕴

1. 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那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

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2.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那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 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那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4. 必须坚持统筹安排。那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由此不难看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意涵之一就是努力实现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实现一种绿色的发展。因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或科学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它有着一种明确的绿色维度，或者说可以做一种泛绿色的阐释。

“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政治正确性在于，发展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仍然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源泉或动力，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顺应和适应这一绝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政治意愿，甚至可以说，我们其他领域或视野下的进步追求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主导的话语与语境。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今已经拥有一种清醒的反思意识，发展无论在国家还是区域层面上都必须是一种真实的发展、健康的发展、理性的发展，尤其是同时在改善民众生活生存质量和遵守自然生态空间容限前提下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反思性发展的最基本标志就是它的可持续性或绿色考量。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更多应在唯物史观和一般哲学价值立场的意义上理解。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只能信奉一种致力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只能是一种基于“弱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立场的物质进步主义政党。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承认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多重制约性，尤其是在面临着诸多全球性难题的当代世界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都趋于承认，人类社会文明无论如何不断进步，我们都必须逐渐接受一种预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取代并不意味着将会能够满足人们无限增长的需求或欲望。简单地说，“以人为本”的发展决不能通俗甚至庸俗地解释为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更不能错误地解释为可以目光短浅或不计后果地破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必须承认，充分考虑到并致力于恢复我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发展才真正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最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既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一社会大系统内部各领域之间，以及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协调，更包括资源、自然和生态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代际、族际与种际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协调，而后者正是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与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理由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可持续发展原则与战略纳入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坚持的可持续发展观的一种延续，而且是一种升级版。其基本理路是，我国现代化实践中依然广泛存在着的大量不可持续发展决策与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不科学的或错误的发展观。同样，许多地方频繁发生的通过牺牲生态环境来获取暂时经济收益或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也是由于不科学的或错误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最深刻意蕴在于其方法论价值。可以说，需要做到统筹兼顾的绝非仅仅是社会方方面面或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分配——尽管这个层面的公平与公正也非常重要，更为重